

※ 師資培育文獻回顧 ※

發乎心，即能形於外？—論「教師發展階段論」的限制

鄭景澤

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)

相較於 Fuller 的「單向發展論」，Conway 和 Clark 在訪談六位密西根大學實習教師後，指出教師「關注事項」的轉變，是同時具有「外向」和「內向」的特徵，此一「雙向發展論」，可以說囊括了教師發展的所有可能性。但深究之，我們卻可以發現，不管是 Fuller 的「單向發展論」也好，Conway 和 Clark 的「雙向發展論」也罷，都只描述表面上的發展方向，而沒有論及造成這些發展轉變的深層因素。這容易讓人摸不著頭緒，到底造成教師內心關注改變的原因是什麼？我們又該以什麼標準，來劃分不同的教師發展階段？而使教師進入每一發展階段的關鍵是什麼？上述這些「教師階段發展論」的學者，都沒有在其研究論文中說清楚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些時候，教師的內心想法，是和其實際教學行為，有著一段不小的差距；「發乎心」不一定可以「形於外」。如果教師「言行不一致」，那麼根據其內心想法，來劃分發展性階段，是否還有意義？因此，我們有必要探究一下那些可能導致教師「言行落差」的外在因素。

一、校園實習文化的影響力

Conway 和 Clark 在文末提到，基層學校的實習文化，容易讓實習教師失去自省能力，使其「向內關注」的發展受到限制。舉例而言，實習教師到了學校現場，所從事的不是教學活動，而是與教學無關的行政雜役；提供實習教師見習的班級導師，本身缺乏自省能力；教育現場的升學主義、考試填鴨，讓實習教師於師培機構的「所學」無用武之地。易言之，「校園文化」深深影響實習教師內在關注事項的變化，可能使其產生教學無助感。來自實習環境的因素，是 Conway 和 Clark 在文中沒有深入探討的部分，縱使密西根大學實習輔導制度再周延，實習教師終究還是得接受教育現場的遊戲規則，更何況師培機構總有「放手」的一天，屆時實習教師的「發展」又往何處去，這才是我們必須加以追蹤探究的課題。

二、學校生活以外的教師關注

Conway 和 Clark 所訪談的六位實習教師，他們的文化背景，並沒有放在文章中討論。他們為何選擇教職？又為何會選擇密西根大學的實習課程？他們選擇實習學校的考量又是什麼？這些問題在沒有得到釐清之前，Conway 和 Clark 就直接了當把訪談焦點放在他們實習期間的內心關注事項上。缺少生命史的訪談資料，我們無法仔細掌握真正影響教師內心關注事項的社會文化因素。試問，基層教師內心所關注的，就只有與學校生活有關的事項嗎？對於不少基層教師而言，「家庭生活」才是其關注的重心。或者說，不少教師是為了可以兼顧家庭與工作，才來從事教職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教師對於班級教學的關注程度，勢必打了折扣。既然名為「教師發展」的研究，那麼會影響到教師生涯轉變的因素，比如自我概念、成就動機、個人能力特質、家庭因素、學習經驗等，都應放進理論模型裡仔細檢視，畢竟教師的生活是多層面的，與教學有關的內心關注，只不過是他生活中的一小部份。

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Conway 和 Clark 在文中只討論教師關注事項的「內外發展」，而沒有討論教師工作本身帶有的意識型態。我們今天欲培養的，是教導學生遵守社會紀律的右派教師，或是鼓勵學生挑戰社會現狀的左派教師。左與右的教育議題，或說教師工作的政治性，亦是 Conway 和 Clark 在文中忽視的面向。在實習教師內在的「恐懼」與「希望」之外，仍有其他重要的事項，是師資培育過程必須加以正視的。

回應文章

Conway, P. F. & Clark, C. M. (2003). The Journey Inward and Outward: A Re-Examination of Fuller's Concerns-Based Model of Teacher Development. *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*, 19(5), 465-482.

本文引注格式 (APA)

鄭景澤 (2011, 9 月)。發乎心，即能形於外？—論「教師發展階段論」的限制。
臺灣師資培育電子報，24。檢索日期，取自 <https://tted.cher.ntnu.edu.tw/?p=431>
(註：「檢索日期」請依實際檢索日更改為 XXXX 年 X 月 X 日)

